

# 红岩精神永远屹立

■程华

## ★ 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它所蕴含与传递的基本理念、价值取向、创作范式、美学风格为大众所高度认同,在于其思想和艺术价值具有跨越时代的永恒性。

经典总是常读常新,绝不随时间推移而泯然于历史深处。这一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上世纪4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在监狱中历经酷刑而不屈。他偷偷用铅笔头在碎纸片上写出了纪实文学《绞刑架下的报告》,真实描绘了一群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歌颂了在狱中不屈不挠奋斗的英勇集体,表达了对祖国、对故乡、对生活的深爱。作者虽然不幸遇难,但这部书被译成90多种文字流传于世界各国,也极大地影响和鼓舞了广大中国读者。

10余年后,1961年12月的中国,一部以反映狱中斗争为中心内容的41万字长篇小说《红岩》,一经出版即引起轰动。几十年间,这本书已再版几十次,总发行量逾一千万册,列入百部爱国主义教育教科书,同时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

《红岩》以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全国胜利在即,山城重庆处于“黎明前的白色恐怖”为背景,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特务之间展开的殊死较量。作者以发生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里的斗争为核心,将重庆城内的学生运动、地下斗争以及川北农村的武装斗争加以交错展现,以大量场景描写烘托气氛,以细节刻画勾勒人物心理,擅在斗争尖锐处着墨运笔,将发生在逼仄空间里的狱中斗争写得跌宕起伏,节奏鲜明。作品在情节转折变化中将人物的精神世界加以凸显,成功塑造了一组壮烈不朽的英雄群像。

国民党反动派全局覆灭的命运不可逆转,溃逃前的困兽犹斗愈加疯狂,革命事业即将取得胜利,革命者个体则面临着牺牲。背景的阴霾,斗争的残酷,场景的惨烈,注定了作品悲壮激昂、惊心动魄的叙事基调。

《红岩》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一部优秀的革命英雄传奇。它以深刻的思想价值与强大的艺术魅力,震撼与净化着读者的心灵,成为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英雄主义赞歌。

自由,生命,人生至高至珍。亲情,爱情,人性本能向往与眷恋的平凡幸福。《红岩》英烈们毅然舍弃这份幸福,只为了让更多人能拥有这份幸福。正如伏契克所说:“为了把铁窗里的今天和自由的明天连接在一起”,有斗争就必定有牺牲。在随时可能失去自由与生命的严酷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信仰。竹签扎进指甲缝、钉板狼嵌进皮肉……酷刑总有暂停之时,黑暗的牢狱生活更考验意志——不能与战友们并肩冲锋战斗,不能亲眼解放大军渡江,不知胜利的曙光何时照入这“活棺材”,也不知自己是否还能等到自由的那一天……然而,为了人民解放、民族利益,他们坚强地面对一切,微笑着舍弃一切,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红岩》是重庆“11·27”大屠杀的亲历者、见证者罗广斌、杨益言以热血与热泪创作的。1948年,他俩先后被囚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与小说中诸多英雄人物的原型共同经历了残酷复杂的斗争生活与生死考验。1949年11月27日,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重庆时,几百名被关押的革命志士遇难,他俩成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将这段悲壮历史告诉后人,罗、杨二人先写下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接着在纪实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提炼和艺术概括,前后撰稿300多万字,历时10年终成恢宏之作《红岩》。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杰出的文学作品不仅能反映时代,也体现着形象塑造的典型性与艺术魅力的永恒性。《红岩》中许多人物皆有原型,比如江姐的原型是江竹筠,成岗的原型是陈然。有的人物来自两个、三个或更多原型的糅合。作品采用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依托故事构架,以独具匠心的情节设置、场景烘托、细节渲染,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系列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但都有着坚定信仰的优秀共产党人群像。

作品摒弃了相对平面化的表现手法,注重挖掘和揭示人物精神世界,善于通过富有表现力的细节,传神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江姐目睹丈夫牺牲后头颅被悬于城墙上,这对于久盼夫妻相聚的她无异于晴天霹雳,但重任在肩、虎狼在前,她只能强压悲痛继续前行。“她的脚步不断踏进泥泞,一路上激起的水花、泥浆,溅满了鞋袜,她却一点也不怕。”此时无声胜有声,她内心的巨痛与悲愤,以及踏着丈夫足迹前进的决心被生动呈现。被捕后,她十指被生生钉入竹签,又被半拖着架回监舍。“她的脸,毫无血色,白得像一张纸。她微微侧过头,用暗淡的、但是不可直视的目光,望了一下搀扶着她的特务……她猛然用两臂甩开了特务,傲然地抬起头,迈动倔强的双腿,歪歪倒倒向女牢走去。”就义前,素爱整洁的她静静地梳头,问难友“我头上还有乱发吗”,随后换上心爱的蓝色旗袍,红色绒线衣。难友含泪递上换洗衣裳,她微微一笑:“我不需要了。”

许云峰受尽酷刑后被单独囚于阴暗阴森的地窖中,却坚持徒手为难友们挖掘逃生密道。临刑前,面对特务头子“许先生到了末日,又是何心情”的挑衅,他报以冷笑:“也许你可以逃跑,可是你们无法逃脱历史的惩罚……你此刻的心情,又是如何呢?”家境优裕的刘思扬抛弃舒适生活选择了革命道路,其二哥买通关节欲保他出狱。在看清特

务欲以他为饵诱捕同志的企图后,他大声道:“我不稀罕这种自由,马上送我回去!”

每个人物形象均可圈可点。尤其扣人心弦的老党员华子良和九岁的“小萝卜头”。十几年前在刑场“陪绑”时,华子良奉上级之命佯装被“吓疯”而潜伏下来,从此长年不说一句话,不与任何人交往,每天或呆坐或木然跑步,承受着不明真相的同志们的鄙夷与唾弃。直到大屠杀前夕最危急时刻,他终于表明真实身份,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小小年纪已随父母坐牢8年的“小萝卜头”,在走廊上捉住一只长着翠绿翅膀的小虫。他小心地把它放进火柴盒,却发现了它的不安。啊,它失去了自由。他自语。他放了它,羡慕地望着它振翅飞了。“飞了,飞了,它坐飞机回去了!”解放了,我们也没坐飞机回去!无辜的孩子,终究未能逃过魔掌。

就连反面人物,作品也极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着重从矛盾冲突、人物关系中去解剖其灵魂。叛徒甫志高被捕前好大喜功,被捕后贪生变节:“把杀人当成终生职业”的特务头子徐鹏飞狂妄、残暴、狡诈以及濒临灭亡的绝望和空虚等,无一不活灵活现、入木三分。

多年来,《红岩》以气势磅礴、悲壮感人的艺术魅力,成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作品,先后被改编成电影、歌剧、舞台剧、连环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一直为人民群众敬仰、诵读与铭记。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大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今天,《红岩》无疑是一部极好的教科书,对日益多元的文化艺术创作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回顾历史,重温经典,初心如磐,信仰永存。《红岩》英雄群像永远屹立于巍巍歌乐山下,红岩精神永远屹立于天地之间,屹立于人民心中,成为激励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 ★ 作品背后的故事

每个国家都有这样一些经典文艺作品,镌刻着民族的记忆和情怀,承载着人们共同的情感和希望。这些优秀文艺作品,历经岁月沉淀,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着灿烂的艺术之光,留下永恒印记。

在中国人民的内心深处,就有这样一首交响乐作品。它荡气回肠、大气磅礴,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听到它那恢宏的旋律总会令闻者动容,肃然起敬。它就是交响序曲《红旗颂》。在重要的历史时刻,或是国家大型庆典活动中,我们常常会听到《红旗颂》温暖、深情、壮美的辉煌之声。它以生动感人的音乐语言讲述着中国故事,彰显着中国气派和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奏响了气势磅礴的中国之音。

■林国宏

《红旗颂》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由著名作曲家吕其明创作。当年写就这部作品时,作曲家只有35岁。我们不禁感慨,到底是怎样的人生体验,能让一个青年人写出这样厚重深沉、感人至深的作品。

自古英雄出少年。1940年,年仅10岁的吕其明与12岁的姐姐参加了新四军第二师的抗敌剧团,成为一名文艺战士。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吕其明经受了战火洗礼和艰苦生活的磨炼。他曾深情地说:“战争既熔铸了我的灵魂、意志,也赋予我血与火、爱与恨的音乐灵感。钢枪伴琴弦,硝烟卷歌声。在这战地课堂,在以抗战音乐和民间音乐为课本的年代,我作为一个只读过4年书的10岁孩子,同时又作为一名部队文工团的文艺战士,像进了一所没有围墙和门牌的生活的大学、战斗的大学、艺术的大学。唱歌、演戏、教歌、行军、打仗、宣传鼓动,把我和指战员们、乡亲们交融在一起,把我一颗稚嫩的心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交融在一起。”

吕其明的成长深受父亲吕惠生影响。吕惠生是一名知识分子。七七事变后,他怀着满腔热血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四处奔波为人民军队筹集粮饷弹药,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名单”。危急关头,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吕惠生携家投奔了新四军。吕惠生在日记中写道:“我之全家,已委托全部生命于革命。革命进则我家存;革命败则我家亡。此已为明显不易之铁的事实,我何虑?”1942年,吕惠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战斗在皖江抗日根据地。1945年9月,他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狱中,他挥笔写下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忧愤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1945年11月13日,吕惠生在南京郊外英勇就义,年仅43岁。

父亲的牺牲,强烈震撼着年幼的吕其明。多年后,回忆起父亲,吕其明动容地说:“父亲走了,虽然他没有留给我任何物质意义上的遗产,然而,父亲留给我巨大的精神财富,使我受益终身。亲爱的父亲给了我生命,也给了我铮铮铁骨、耿耿丹心、一腔热血、浩然正气。父亲的英雄形象是我崇高的目标,让我踏着父亲的足迹前行。”

1945年8月,15岁的吕其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入党是我的起点,从此确立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文艺观,我决心把一切献给党,献给祖国和人民。”

## 二

革命家庭的精神浸润,部队文工团9年的战斗生活和艺术实践,让吕其明受到极大的锻炼和艺术熏陶,也深深影响着他的音乐创作。这一切为他后来创作《红旗颂》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和烈火般炽热的激情。他说:“父亲和无数先烈志士的奋斗和牺牲,在我的心灵深处耸立起了一座信念和情感的丰碑。”吕其明后来创作的《红旗颂》《铁道游击队》《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使命》《白求恩》等众多主题鲜明、激情澎湃的音乐作品,正是他对心灵深处那座庄严丰碑的深情倾诉。崇高伟岸的英雄精神,化作串串音符从作曲家内心深处迸发出来,感动着无数倾听者。

1965年2月,吕其明接受了音乐界前辈们交给她的一项创作任务,创作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和人民军队的音乐作品,指挥家黄贻钧建议曲名定为《红旗颂》。多年后,吕其明再次谈起这段历史,依然激动不已。“当年接受《红旗颂》的创作任务时,心潮激荡,夜不成寐,深深地陷入了对自己战斗生涯和在红旗之下成长的回忆之中,提起笔时,满眼是迎风飘扬的红旗。那是一面用千万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红旗,这其中也有我父亲的鲜血。红旗,在我眼中已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帜,而是革命的象征。它指引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终于迎来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那一面鲜艳的红旗一下就被新中国的国旗取代,天安门门前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瞬间那国

# 气势磅礴的中国之音

## — 交响序曲《红旗颂》赏析

歌声、礼炮声、欢呼声,响彻天安门上空。这情景一下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仿佛转化成一串串无比美妙的旋律。我真是难以抑制住内心的激动,饱含热泪写下了《红旗颂》的第一个音符……”

《红旗颂》以交响序曲的体裁形式创作。作品分为三个部分,单主题贯穿发展的奏鸣曲式结构。作品开篇,在引子部分由小号吹出嘹亮的号角,那是战斗的号角、胜利的号角。引子的中间部分,作曲家有意识地从国歌的曲调因素中派生出一个主导动机。这个动机贯穿整部作品,树立起一个鲜活动人、催人奋进的红旗飘舞形象。显示部的主题,宽阔而抒情,优美又宏大,这是贯穿整部作品的颂歌主题,热情讴歌了党带领人民群众突破一切艰难险阻,取得了辉煌瞩目的伟大成就。代表红旗的主导动机与颂歌的主题相辅相成,构成全曲的主体基调,音乐形象鲜明生动,统一凝练。连接部从主题中派生出一条温暖细腻的音乐线条,娓娓道来,仿佛诉说着峥嵘岁月那一段段动人往事,又好似把党比作母亲的深情讴歌,尽情表达着对党的无限感恩与崇敬之情。在展开部中,由作品开篇的四四拍子转入四二拍子,三连音节奏的密集运用,营造出紧张激烈的战斗气息,把听者带入到炮火纷飞的革命岁月。红旗主题的出现,代表了党带领人民群众,在红旗的指引下浴血奋战的壮丽场景。再现部中,显示部主题再次升华,乐器浓墨重彩,旋律呈现出更加丰富厚重、波澜壮阔的音乐特色。尾声引入《东方红》和《国际歌》的音调因素,展现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继往开来、永创辉煌的恢弘气势。

作品和声语言质朴亲切、简洁明朗,烘托着气势磅礴的旋律进行,一股难以遏制的澎湃激情油然而生,使得整部作品始终洋溢着崇高壮美的音乐气质,深刻体现了作品宏大的叙事结构,产生了英雄性、史诗性的艺术效果。

作曲家在创作中,将东西方音乐表现手法融会贯通,积极尝试将西方交响乐创作的经验和我国的民族音乐巧妙融合,特别是借鉴了西方音乐贯穿全曲的主导动机写作手法,树立起一个代表红旗飘舞的生动形象,象征着伟岸的红旗精神在风雨洗礼中历久弥坚,催生出不懈的革命动力。作曲家还广泛吸收多种民间音乐元素,用概括的手法使颂歌的主题音乐更加具有浓郁的民族特征、民族神韵和民族气派。

## 三

1965年5月,《红旗颂》在第六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作为开幕曲首演,获得巨大成功。作品以其厚重的历史题材,宏大的艺术构思,以及质朴亲切的音乐语言,受到听众的喜爱。作品也为中国风格的交响乐创作,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

这部作品在国际上也很有名,曾在维也纳、纽约、布达佩斯、莫斯科等地音乐厅奏响。有国际拍卖公司看中这部作品,游说吕其明将其拍卖,被吕其明断然拒绝。他说:“《红旗颂》不能卖,你们出再高的价格都不卖。《红旗颂》和其他作品情况不一样,它不是普通的作品,也已经不是属于个人的了,而是人民和国家的财富……我如果卖了的话,卖的不是《红旗颂》,而是我的心了。”

《红旗颂》从首演到今天,已走过半个多世纪,但它依旧魅力不减,那壮美动人的旋律一直响彻在祖国大地。



▲ 阅图

## 利刃出击

■摄影 唐志勇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武警重庆总队官兵在山地追击训练中,狙击小组快速出击的场景。画面人物主体突出、动感十足。动与静、虚与实的巧妙结合,让画面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也令人感受到浓浓“战味”。

(唐志勇)

# 生动讲述基建工程兵的故事

■周百义

读完樊希安这三部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我不禁想起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信中谈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所说的:“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的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后人要考察基建工程兵部队从建立、成长到走向历史深处的过程,樊希安的作品应当说是一部形象生动的文献资料。他在《鹏城飞歌》后记中写道:“我曾经是这支部队中的一员,我用感恩的心,笨拙的笔,去表现这支在特殊时期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

当然,除了他自己的亲身体验外,为完整记录这段历史,他还研读了有关基

建工程兵部队的各种史料,力图能够全面真实地记录下这支队伍在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在三部曲中,作者描绘了这支部队近20年的战斗史以及社会的发展变化。可以说,作品既是基建工程兵部队的一部形象化历史,也是那些年间中国社会发展的艺术写照。

为自己曾经服役过的部队立传写史,是樊希安的“初心”。也许有人认为,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如果作者仅立足于去记录历史、展现历史,会限制小说的文学感染力。其实,从小说的发展史来看,“讲史”是中国小说的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其中有不少篇章可以看作是精彩的小说。宋人在勾栏瓦舍中“讲三国”“讲水浒”,罗贯中、施耐庵在民间传说和话本的基础

## ★ 阅读时光

樊希安的系列长篇小说《不灭的军魂》,分为三部曲《兵山劲歌》《鹏城飞歌》《乌蒙战歌》,描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部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传奇故事。

小说从上世纪70年代写起,中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部队,担负国家重点工程和国防工程的建设任务。主人公曾宪云参军后跟随这支部队转战南北,从贵州盘县到大山到深圳经济特区,一路披荆斩棘、拓荒奋斗。在这一过程中,曾宪云经过部队熔炉的锤炼,爱情与友谊的滋养,心灵得以丰富完善,人生价值也得到了实现。